

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协同救灾研讨会召开

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需建立协同救灾机制

■ 本报记者 王勇

12月16日12时46分,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北纬28.24度,东经104.95度)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2千米。截至12月17日7时30分,此次地震共造成17人轻伤,均送往乡镇卫生院救治,其中6人已出院。初步统计,房屋一般受损6936户1.09万间,严重受损231户526间,倒塌15户23间,共转移安置386人。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启动IV级应急响应救灾指挥机制。四川消防总队前往地震灾区开展救援。中国地震局启动现场调查和烈度评定等工作,四川、云南两省地震局正全力协助地方开展房屋受损情况排查和受灾群众安置。

与此同时,社会力量也行动起来。据四川发布客户端记者了解,西林凤腾通航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机制,准备了两架空客H125直升机,用于空中救援。

作为灾害救援中最快速的交通工具之一,航空救援在灾害救援中的运用越来越多。自汶川地震以来的多次国内外灾害响应中,多次出现民用航空力量和社会组织合作救灾救援的案例。但这种合作目前还处于个案合作阶段,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

为了进一步加强航空企业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了解,提升航空应急救援协同水平,促进航空救援有关机制与模式改进,12月14日,中国慈善联合会组织召开

了民用航空与社会组织协同救灾研讨会,来自航空企业、社会组织的代表和相关专家就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鼓励通用航空参与应急救援

“我国航空救援起步比较迟,但发展十分迅速。”中国民用航空应急救援联盟秘书长孙守军表示。

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展的指导意见》,截至2015年底,通用机场超过300个,通用航空企业281家,在册通用航空器1874架,2015年飞行量达73.2万小时。

《指导意见》提出,要扩大公益服务,鼓励和加强通用航空在抢险救灾、医疗救护等领域的应用,完善航空应急救援体系,提升快速反应能力。

在此前后,民用航空企业已经多次在地震等灾害发生后参与救援工作。

据孙守军介绍,2017年,九寨沟地震发生后,通过联盟半个小时就调集了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参与了接送专家、物资转运等工作。

中国的民用航空企业甚至还走出国门,开展了灾害救援。2015年,缅甸遭遇特大洪涝灾害,中信海直的一架直升机就执行了水灾救援工作。“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直升机搭载任务员在海外执行救灾任务。”中信缅甸(香港)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马传福表示。

我国社会组织在参与尼泊尔地震、厄瓜多尔地震救援时也多次搭乘使用了直升机。

需解决政策、人员、资金等多方面问题

随着民用航空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应急救援中,其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多,包括:灾情实时监控和侦察、灾情实时动态研判与协调、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物资投送、伤员灾民医疗救援物资投送等。尤其是地震、洪灾等发生后形成人员、信息孤岛的情况下。

但是,由于民间航空救援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存在多种多样的问题需要克服。

首先,在这一领域还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如何把民间航空救援纳入到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国家购买服务如何操作等都需要探索。”孙守军表示。

其次,需要大量接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

一方面,社会组织等民间力量对航空救援并不熟悉,需要培养大量掌握航空保障等相关后勤技能的社会应急处置人员。

例如,当社会组织到达灾区呼叫直升机之前起码需要知道如何为直升机找到合适的起降点。

另一方面,航空企业本身也需要配备专业的救援人员。例如,救生员、绞车手、飞行医生、地面引导员等,这其中有些航空



准备参与执行宜宾地震救援的直升机

企业可以自己培养,但有些需要社会培养。

再次,航空救援的费用还没有合适的解决方案。“发动机一响,黄金万两”,航空救援会产生颇为可观的费用,航空企业不可能无限制的付出,费用从哪里出?政府购买服务方面,还没有合适的产品标准;社会组织的财务系统里也还没有这一支出项目。

此外,还存在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社会认知度低、信息不畅等一系列问题。

创建基金支持航空救援

“航空界有能力有意愿,但机制还没有建立,航空公司和社会组织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理事长王

珂表示。

面对这一现状,究竟该如何做?

“航空企业和社会组织之间互相不知道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要建立社企沟通机制,探索战略合作。”中国扶贫基金会灾害救援部助理主任刘志华表示。

王珂则提出,要成立平台,制定标准,推动政策发展。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王英颀则认为,双方应该通过合作救援探索更多的应用场景,提高航空救援在政府、社会等的认知度。

中国地震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建议创建基金,开展重特大灾害低空应急救援行动、打造低空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示范项目、构建低空应急救援培训科目和体系……

(上接 08 版)

再一个,还是要增加直接金融,也就是债市。我们国家的企业债几乎是零,比如今年新三板面临着上海科创板的冲击,科创板将来是注册制,一注册就可以上市,那么,这些新三板谁还去挂牌?新三板其中的一个用处就是作为地方性的债市,可以有承销商承销企业的债券,这样便可以给一些不大不小的企业一些机会,比如:发一些地方性的债。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可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但长效机制还是要做改革,不做改革没办法推,过去这20年,基本都是靠行政命令从背后推着银行去做的。

《公益时报》:过去大家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过程。最早我们认为它是利己的力量,后来我们认为它是有益的补充,再到后来,我们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你认为对民营经济的理解还有没有进一步深化的可能?

姚洋:当然有可能,如果论对整个经济的贡献来说,城镇的就业率民营企业提供了80%,剩下的20%很大一部分是政府就业,真正在国有企业就业的人占比相对较少。我觉得今后应该淡化所有制,不管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没有必要非要分得那么细,应该打破所有制的迷思。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以国有企业为基础,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认为不一定!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可以有很多手段,比如税收调节、政府再分配、政府投资、政府对老百

姓更加关注等,这都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所有制就没有必要去强调了。

企业家精神的核心是勇于冒险

《公益时报》:改革开放以来40年来,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社会公益领域也表现突出,比如精准扶贫领域。这也是企业家精神的一种体现。那么你是如何理解企业家精神的?

姚洋:我觉得企业家精神最核心的就是勇于冒险,比如宋国青,他是芝加哥博士,他有个弟弟刚初中毕业,是做国际期货的,结果他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弟弟赚得多,为什么呢?一个学者,擅长有很多的分析,不敢冒险,而他弟弟就敢冒险。企业家一定要敢于冒险,至于未来会是什么样,拼搏了才知道,而学者都想去分析清楚。张维迎老师说,企业家就是“成者王侯败者贼”,失败的企业家大家都说他是骗子,然而他若是成功了就夸他真了不起。

过去有一段时间,总有一种说法:中国企业没有社会担当,

捐款太少。事实上,过去十年,企业在慈善方面的投入金额越来越高。我们国家的企业家捐款其实并不亚于美国,知名企业家捐款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论这个比例,中国要比美国的企业家捐的多。当然,我们远远超过欧洲,欧洲根本没有捐款的传统,日本也没有。企业家从以前的零星捐赠到现在系统性救助,通过慈善改变社会,已经不再像以前完全停留在“给钱”的层面。如今,企业家捐赠都强调有一个系统性的设计,通过捐款去改变社会行为的方式,创造一种模式,并且让这种模式可复制,在某种意义上这是创造了新的社会管理和社会运转的模式。

《公益时报》:你觉得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企业家精神和担当?如何引导他们发挥这种精神,如何引导他们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姚洋:我觉得我们最应该做的:第一,给企业家一个制度的保障,不能再把今年上半年的事情重演一遍,在制度上要给企业家足够的保障,让他们放心做企业;第二,企业家自己多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第三,针对中小型企业要提高管理能力,除了重视

企业内部的管理外,中小型企业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策和方向。因此,中小企业应设立研究部门、规划部门,研究国家政策以及把控整个行业的趋势动态,也可将两个部门放在一起。企业做到一定程度一定得有这样的部门,有三五个专职人员,给公司做咨询。如今,只有一些大型企业有这样的部门,规划研究部门的设立应该引起小企业的高度重视。

《公益时报》:本届中国公益年会将以企业家群体为主体,探讨企业家的时代担当和企业家的公益创新,你对这样一届公益年会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姚洋:我认为公益年会应该变成企业家互相交流公益经验的一个平台,公益的最高境界就是把公益做成企业战略的一部分,这样做公益就不累了。其实每个行业都可以找到自己做公益的方式,比如房地产可以侧重做环境保护、节能建筑等,可以推广和资助这方面的研究,这也属于企业战略的一部分,研究出来后既可以拿过来用,也可以降低成本。如果能够通过中国公益年会鼓励大家做这样的公益,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方式。